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高屋建瓴地向全世界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一百多年来，从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潮流到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革命导师的这一伟大预言。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也想起了社会主义的招牌，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的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前些年，不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冒出了一个火车误点、田里长虫、经济建设速度慢、全国都要成文盲的最新“社会主义”吗？要问这个“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妨让我们读一读由“四人帮”的御用上海写作班子炮制的一本帮书——《谈读党内资产阶级》（以下简称《谈读》）。如果说，“四人帮”是这种最新“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那末，这本《谈读》，便是炮制这种反动社会主义体系的代表作。

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尽管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色彩斑斓，名目繁多，但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为我们探得了一块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谈读》这本帮书，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悉心地查证、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四人帮”炮制“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并进而在中国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制造理论依据的。

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一切假社会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宣扬“自由的人民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则鼓吹“全民国家”。他们都以有的表现形式，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四人帮”则大谈“阶级斗争”，大谈“继续革命”，以极“左”的表现形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谈读》一书装出坚持辩证法的样子，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两重性”论。这一谬论，是“四人帮”在大毒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抛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的发展，也可以说是《谈读》的一大“创新”。书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两重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两重性的集中表现。一方面，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另一方面，由于还要保障资产阶级特权，这个国家又跟旧社会差不多。”

显而易见，“四人帮”的着重点并不是前面的“一方面”，而是后面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资产主义的因素。《谈读》在另一个地方就说得十分露骨了，它说：“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职能。”好一个“在本质上”！一语道出了真情，什么“两重性”，是假的，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才是它的真意。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权利论的无知篡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都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把这种平等的权利抽象出来，叫做资产阶级权利。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必须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宪法的第十条中就有明文规定。“迫使人们遵守”的这种“法权规范”，不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体现吗？哪有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职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至于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与革命》，译文有校改）！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保障资产阶级权利，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这个意义上说的，根本没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意思。

《谈读》一书，就是这样卑劣地篡改马克思主义，把“四人帮”编造的“资产阶级法权”膨胀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中最主要的弊病，并进而炮制无产阶级专政“两重性”论，为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制造根据。

《谈读》从这种臆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两重性”出发，把剥削阶级专政的所有坏东西，统统硬加在无产阶级专政头上，给无产阶级专政抹黑。书中说：“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那末，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在这种土壤上产生的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气候。”

我们知道，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政权的一种固有习气，因为从来的剥削阶级政权都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民实行压迫、实行专政的工具。它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政权必然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的新型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能够推选自己的优秀代表组成各级人民政府，以代表人民并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这种对广大人民群众施行最广泛的民主的职能，说明官僚主义作风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中出现官僚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

一种假左真右的法西斯社会主义

一批判大毒草《谈读党内资产阶级》

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

编者按：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策动其在上海的余党炮制了一本题为《谈读党内资产阶级》的黑书。它是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之后，又一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

《谈读党内资产阶级》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鼓吹“四人帮”捏造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疯狂地攻击、诬陷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是“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又一罪证，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这株大毒草从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炮制，于九月底定稿，并排印出了清样。原拟在十月公开出版发行。由于“四人帮”很快被粉碎，而未及出笼。但该书曾五次以“广播讲座”的形式，用《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为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十天以后，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还在播讲，波及甚广，影响极坏。

“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罪行，在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判“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必须指出来加以清算。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松劲情绪。要充分利用“四人帮”炮制的这些反面教材，把它揭露挞伐，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斗争中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夺取批判“四人帮”斗争的全胜，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完成新时期总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谈读》按照这种反动思想，进一步地、更加明目张胆地把它同“党内资产阶级”紧紧地扣在一起，把散布所谓“唯生产力论”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活动”的一条重要的“规律”。书中说：“鼓吹阶级斗争令您谈论和唯生产力论，这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反党活动的新教条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说什么：“阶级斗争令您谈论是唯生产力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

“四人帮”及其帮手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对社会变革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理。他们故意把发展生产力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立起来。书中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鼓吹阶级斗争令您谈论和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就是扬掉斯大林这个病，扬掉无产阶级专政。这话说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唯生产力论。马克思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包括：领导反革命，抵抗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包括：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总而言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国际上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才能更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国内来看，只有高度重视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增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才能充分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见，强大的生产力，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又为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样，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继续革命都是为了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而生产力的解放也必然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以便进一步加以改革。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三个方面的继续革命就是这样地密不可分、不能割裂的。“四人帮”妄图把迅速发展生产力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强行抹去，这正表明，他们是一伙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国新形势的总任务，正是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光辉体现。在本世纪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敬爱的周总理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指示而提出的宏伟蓝图，这是赋予我们的光荣、伟大的任务。《谈读》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攻“唯生产力论的新标本”，是要“摧毁美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用‘仙山恋月’的幻想，妄图把劳动人民重新打入人间地狱”。书中还拼命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执行的无产阶级政策。把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是“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同我国近代史上屡犯卖国的洋务派之流有什么两样”等等，颠倒黑白，恩将仇报，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人帮”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这样地切齿痛恨，对迅速发展生产力就是这样地胆战心惊。妄想他们的反革命逻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民经济繁荣，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遭受破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炮制的这一套破坏生产力、取消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深深体验过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哪里的领导权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篡夺，哪里的生产遭到破坏，哪里的资本主义就泛滥起来。“四人帮”及其余党作威作福，花天酒地，过着糜烂透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管人民的死活，人民喝西北风压根儿与他们无关。此景此情，不是对“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的绝妙讽刺吗？！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罢了。他们口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地道地道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和展开条件下的产物，它之所以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它毕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但今天“四人帮”的这种破坏生产力、取消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因而必须彻底地加以批判。

“四人帮”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更加焕发革命青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华主席指示，联系群众，关心同志，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严重疾病置之度外。他坚决贯彻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积极开展市政协商会议的工作，亲自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热情关心政法公安工作，领导筹建人民检察院，他为革命鞠躬尽瘁，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悼词最后说，我们沉痛悼念黄赤波同志，要学习他热爱领袖，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学习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优良品质；学习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深入实际，任劳任怨，处事果断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高举毛主席的伟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决响应华主席的战斗号召，把拥戴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解放思想，加快步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将我国早日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十月二十日上午，彭冲、严佑民、韩晋一、王一平、赵行志、杨德、张承宗、关子良等领导同志和黄赤波同志的生前友好赶来向黄赤波同志遗体告别。

黄赤波同志追悼会昨天隆重举行

（上接第一版）他为了保卫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来沪期间的安全，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倾注了全部精力，做到万无一失。他在市委领导下，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保卫上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悼词说，黄赤波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他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为名利，不图享受，生活俭朴，艰苦奋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黄赤波同志不愧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恶目的，抛出“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口号，颠倒教我军，倒转专政头。他们使用法西斯手段，捏造罪名，把黄赤波同志投入监狱达七年之久，横加摧残折磨，使他身患重病。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法西斯暴徒，黄赤波同志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粉碎“四人帮”后，黄赤波同志满怀对英明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热爱，对林彪、“四人

郊市多种经营生产要来一个跃进

市财力、农办联合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提出任务

本报讯 市革委于最近在松江县召开了本县多种经营生产方面的经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提出了今后大力发展的方针和措施。副市长先白以广播电台办公室副主任万景亮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国营农场、各垦区有关单位的同志一千多人。

会议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

多种经营生产，尽快地把

多种经营发展上去，作出了一系列

指示，对我们发展多种经

营生产是一个极

其重要的前提。

说，条件也是很好的，虽然土地发

展，但也有相当的困难，劳动力也

是工业和出口的有利条件。

促进多种经营也是有利条件。

坚持因地制宜，要搞好多种

经营，要是适合农村加工的农副产

品，加工工业，已办的要有

计划地放下社队办，各县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要多发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方

向和目标。

认真落实党的经济政策，

要搞好多种经营，

要发挥多种经营的潜力，

要充分地利用，不占用土地而

发展多种经营，

要充分利用，不占用地而发展

多种经营。

促进多种经营，要努力

发展多种经营，

要充分利用，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范文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组织炮制的又一株毒草。这本毒草书，打着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幌子，篡改科学社会主义，把“四人帮”捏造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谬论加以“理论化”、“系统化”，露骨地为“四人帮”兜售反革命政治纲领。它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炮制，到同年九月底定稿，在短短的七、八个月中，三改其名、三易其稿，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紧密配合。剖析它的炮制过程，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疯狂性，看到他们是怎样打着马列主义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货色的。

一九七五年底至一九七六年年初，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他们先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发社论，写文章，以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区别”为名，说什么有些人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缺乏认识，对批“走资派”有抵触，“要加深认识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问题”，为公开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舆论。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又同当时在北京的“四人帮”余党马天水等多次密谋，策划怎样全面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张春桥向余党布置回上海后要立即召开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并对会议要讨论的题目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范围也作了具体规定。

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个名为“理论讨论”，实为贩卖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黑会，在上海开场了。会议一开始，“四人帮”的一个余党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别有用心地提出一连串煽动性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理论和文艺界应该怎样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反映得深刻一些？怎样去分析和表现“正在走的走资派”？在“四人帮”余党的竭力煽动下，一时间，“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成了会议最新鲜最时髦的中心议题。什么“老干部到社会主义时期必然蜕化”，什么“老干部是‘破坏生产力’的‘旧势力’”，什么“老干部把资产阶级权利看作‘命根子’”等等怪论不胫而走。“四人帮”的余党在会上还一再鼓动要从“理论”上阐述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规律，要用文艺创作描写各种各样的“走资派”，甚至威胁说“批不好要打屁股”，“写不出是因为自己对资本主义道路有点想”。这个会议先后开了五天，开得硝烟弥漫，阴风大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黑会。

会议以后，原上海市委写作组那个分管经济的头目，立即组织一批青年，要他们按照这次黑会定下的基调，编写一本定名为《谈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的小册子，内容分为“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四个部分。他煽动说：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把“对立面搞出来”，“批△为什么阻力这么大，说明△有基础，所以要批△”，亮出了他们写这本小册子的反革命目的，是要诬陷邓副主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层层推“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二月底，上海召开了“理论工作座谈会”以后，三月，辽宁也召开了十一天的“理论讨论会”，四月，北京又召开了为期九天的“理论讨论会”。在“四人帮”统一指挥的这个反革命三重奏中，北京召开的“理论讨论会”，明确提出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集中讨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是由其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决定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权力”，以及权力怎样转化为资本，资产阶级怎样从自由竞争、垄断阶段发展到“党内资产阶级”这个垂死阶段等一整套荒谬论点。张春桥对上海仍然停留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的问题上，大为不满。他批评说：“这是在搞理论学术讨论”。张春桥的批评，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更为忙碌起来。原写作组分管经济的头目也不甘落后。他感到原来定名为《谈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那本小册子，调门不高，决定一面将书名改为《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一面下令走马换将，另派编写人，重新改写第二稿。

修改后的第二稿，在结构上同第一稿虽然没有什么变动，但在内容上已经作了较大的修改。它同北京的“讨论会”南北遥相呼应，大肆鼓吹“共产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反复论证“党内资产阶级”是什么“客观存在”，并胡说什么“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世家中的最后一代”，以此来宣扬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历史形态”的谬论，为“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反革命舆论。

第二稿尽管比第一稿的调门升高了，在“理论”上也作了一番修饰。但是，原写作组分管经济的那个头目看了以后，仍不中意，认为理论“深度”还不够，决定再换一批人重新改写。这时已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间，正是“四人帮”大做黄粱美梦的时候。为了抢着在这以前抛出这本毒草书，向他们的主子报上一功，原写作组分管经济的那个头目急不可耐。他一方面匆匆忙忙拿来外地编写的三本有关论“党内资产阶级”的小册子，要编写人员吸收其中的一些观点，并嘱咐把上海编写的另一本大毒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精华”也集中起来，写进这本小册子里面去，限期一个月之

内改好。另一方面，书还没有动手改写，他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立即安排这本书的出版。一九七六年九月底，这本毒草书终于仓促改成。原写作组分管经济的那个头目，立即定稿发排，在发排的过程中，他把这本毒草书的名称最后改定为《谈谈党内资产阶级》，以示其反革命的尖锐性和鲜明性。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毒草书，肆意歪曲和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各个方面为“四人帮”捏造的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制造理论根据，几十次指名道姓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集当时报刊有关这方面文章的反动观点的“大成”。它有八个章节，共七万字。这本黑书原计划于十月出版，后虽因“四人帮”垮台而夭折，然而它的毒汁却已散发开来。在这本书修改的过程中，原写作组分管经济的那个头目，不等成书出版，就另组织一些人，把第三次修改稿的内容，改写成八讲通俗稿，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学习节目中广播，从一九七六年八月至十月，播送了五讲。当前，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本毒草书，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小册子在第一章中，摘引了列宁的一句话：“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九十一—九十二页）接着，就以此为论据，说什么：“在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到党内来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不错，上述列宁的这段话是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见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紧接着这段引文之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完全对立的因素，也就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反革命的领导核心下，走资产阶级路线，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非常清楚，列宁在这里所说的阶级关系变化，是指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变成了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广大劳动人民，坚持阶级斗争，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社会主义管理职能会产生阶级吗？

树清

“四人帮”一贯攻击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的《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毒草书，适应“四人帮”的反革命需要，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职能与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鼓吹什么社会主义管理职能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源，说什么这一职能会使我们的干部“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为了论证这一反动观点，小册子首先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分工。书中说：“由国营或者劳动群众选派一部分代

表来行使领导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这样，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这种社会分工的存在，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接着便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从而论证“党内资产阶级”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中产生出来的。这完全抹杀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脑体分工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管理虽然还存在着脑体分工的差别，但是这种分工与旧社会的分工是有根本区别的，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和群众还存在着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差别，但这并不是对立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管理制度的改善，随着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普及提高，这种差别也会日益得到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它会产生出一个阶级来呢？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引用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这也帮不了它的忙。恩格斯这句话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恩格斯还有另一段话。恩格斯说：由于“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所有制和对产品占有的关系决定着分工的性质和阶级的划分。恩格斯说的“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是指从分工这一侧面可以看出阶级的划分来，而决不是说从分工中会产生出阶级来，更谈不上什么“培植党内资产阶级”。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鼓吹社会主义的管理职能会产生出阶级来，用心十分险恶。它一方面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为“四人帮”取消企业管理制造反革命舆论。然而，《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一箭双雕的反革命阴谋是无法得逞的。它制造这些反革命谬论，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驳所谓资产阶级的“第三种形态”

余惕君

“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虚构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的小册子，为“四人帮”所虚构的这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制造理论依据，卖力地鼓吹“党内资产阶级”是什么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以后，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历史形态”。

这种所谓“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目张胆的篡改。对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革命导师曾作过许多科学的概括和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它是在封建社会瓦解时期，小商品经济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资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两个时期，即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这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高度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自由资产阶级发展为垄断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日益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愈加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面对着各种日益尖锐的矛盾，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和战争政策。这样，必然引起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剧烈反抗，革命危机接踵而来。列宁在《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全面地分析了

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其表现形态上有新的特点，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考察，它仍然摆脱不了腐朽、垂死的噩运。我们今天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但《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小册子却宣扬：“从自由竞争时期

的自由资产阶级，到垄断时期的垄断资产阶级，到社

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它发展

过程中依次出现的几种形态。”似乎帝国主义还不是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垄断资产阶级也不是垂死的阶

级，还要向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发展。

这不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篡改又是什么？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小册子，为了使其

“第三种形态”论有所依据，还鼓吹说：“党内资产

阶级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的

“最基本的内容”。

诚然，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这就是资产阶级由统治阶级成为被统治阶

级，无产阶级则从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

级的政党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这种变化决定了社会

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国内外阶级敌人懂得，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机

会主义者出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要好得

多。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从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但是，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阶级斗争的这种新特点，并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的表现，而恰恰是资产阶级不断被削弱的一种垂死挣扎；这样，又怎会出现资产阶级的“第三种形态”，发展出来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呢？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3页）毛主席也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党内的走资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办”和奴仆，不论他们地位高低，作用大小，对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来说，总是从属的关系，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新形态”。

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还大量引用苏修例子。这同样是徒劳的。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后，在国内，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大肆实行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则到处侵略扩张，妄图称霸世界。他们控制的国家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在本质上却同帝国主义完全一样，都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同样，苏修叛徒集团虽然还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但实际上却早已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第三形态”。

《谈谈党内资产阶级》制造种种根据，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作为“资产阶级”，加以打倒，以实现“四人帮”“改朝换代”的迷梦。然而，真理不容篡改，事实岂能抹杀。《谈谈党内资产阶级》为“四人帮”捏造“党内资产阶级”伪造理论根据，鼓吹所谓资产阶级的“第三种形态”，到头来也只能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罪证。

洪远朋

一些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句话，宣扬“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的反动谬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法权”等条目中，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非颠倒，故弄混淆，完全是一派帮腔帮调。

《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部分)这一分局，更是直接地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服务的。它大搞影射文学，任意篡改、伪造历史，批宰相，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大造舆论。这在“文革”期间可真可谓如火如荼，以吕后白皇后之名，

就吹捧吕后成了一个“有卓见、有魄力、有功绩的政治家”，“亲自执政，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能从大局着眼，维护国家利益”，“为维护全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上书拥护她当皇帝”等等，抬出吕后这个历史的亡灵，来为江青当女皇鼓吹、劝进。仅此一例，已可见该书的反动本质。该书向全国大量发行，流毒深远。

1976年7月，又编写出版了《儒法斗争史话》一节。这是一本宣扬“四人帮”那一套关于“儒法斗争”反动谬论的通俗读物。全书240000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青年自学丛书”编写此书也是姚文元的主意。他

青年毛泽东出狱发心情况作批示：“如果增加一些青年之更好。”朱永嘉即布置写作组历史组事办的第一期青年集体制着写。朱说：“这本书要按原已发表的罗思德（译者注：这个青年集体制着写）来写。”因此，实际上成为罗思德“批毛评法”文坛上的一颗闪光点。例如：在《楚汉相争》、《吕后本》，批判了一系列反动观点。如在《楚汉相争》、《楚汉风云》篇中，通过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当女皇造势；在《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大泽乡风云》篇中，通过批评“鸿门宴”，歌颂攻击周恩来总理；等等。朱永嘉还要求批判插图，画有吴国祥。该书出版后大量分发给各地的知识青年。由于采用了通俗生动的形式，诱人阅读上当，危害极大。

1976年8、9月间，人代会《谈邓小平反攻》一书，由新華社组织经济组人员编写。全书共分8章，约70000字。1978年10月出版，因“四人帮”垮台而夭折。但前5章已于8月11日起，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为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中广播过，流毒很广。它捏造我们党内形打了一个资产阶级”，说“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的“第三种历史形态”，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主力部队”；它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荒谬地把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密切关联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

的重要经济基础”，它宣扬“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就是‘民
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妄图把大批
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打下去，
它疯狂地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挂帅人物”，说
邓“在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
事件”，等等。

第二，私编和伪造中共党史。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1971年春张春桥要《红旗》组稿组凑
集一些人为中央两报一刊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
文。当时张曾授意朱永嘉私编党史。他说：“中央暂时不会编党
史”“你们可以找几个人先搞起来”。他明知编写党史的权在中
央，仍说：“你们这个班子不要散，但也不要成立（公开？）机
构，否则将来搞起运动来难办。”朱永嘉得到张的这些话，叫嚷
“写《党史》的‘令箭’拔来了！”积极筹划成立了“党史组”，
由写作组历史组的吴瑞武具体抓。朱对党史组的人员说：“要注
意保密，公开的说法是为大学编一本党史教材。”后来成书出笼
时就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名称。从1971年7月开始
编写，1973年7月出书，1975年出修订本，内部发行各版合计
15000部。此外，朱永嘉、王知常还指令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搞

了两种缩编本（一是教师用书，一是学生课本），取名《中国共

产党历史学习提纲》，塞进中学政治课当教材。缩编本仅在上海
使用量即达1000000册，还流传到外省、市。
这部私编的党史，其主要问题是伪造党的历史，为“四人
”鼓吹“改朝换代”，篡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历史”
“谎言”。它肆无忌惮地攻击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所谓“资产阶
级民主派”，否定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是“五四运
动”时期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把他们光辉的名
誉从党的创建史页上完全抹掉。它诬陷、攻击许多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以后都犯有路线错误。
它讲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极少提到革命老干部的名字，
在解放战争时期，甚至连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
英的名字都被抹掉；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一大批老
干部的历史功绩，更是以诬蔑刘少奇在那里推行一条错误路线
为借口，几乎全部抹煞。它打着“突出毛主席”的旗号，全书
只写毛泽东一个人的活动，割裂了毛泽东和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恶毒地诬蔑、贬低、抹煞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同时，它却硬把“四人帮”塞进党史，竭力加以
美化吹捧。如以“突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为名，吹捧江
青“直接领导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斗争”“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
域里的伟大斗争”。全书提到江青的名字，竟有10处之多。还
挑拨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塞进了党史。